

传承与嬗变之间

——关于北方游牧民族的“纛”

陈晓伟

《周礼》中记载：“及葬执纛，以兴匠师。”纛为何物？

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曰：“纪信乘黄屋车，傅左纛。”李斐的《集解》对纛做出了解释：“毛羽幢也。在乘舆车衡左方上柱之。”蔡邕也进一步描述它的具体形制：“以牦牛尾为之，如斗，或在骝头，或在衡上也。”“黄屋左纛”作为天子舆制，不鲜见于后世的史籍。如石勒称赵王后，就开始了典章制度的完备，其中之一就是“制轩悬之乐，八佾之舞，为金根大辂，黄屋左纛，天子车旗，礼乐备矣”（《晋书·石勒载记下》）。

细心品读中国古代史料，我们就会发现，“纛”并非是中原王朝的专利品，突厥、回鹘、契丹、蒙古乃至满洲等民族都存在着树纛的现象。并且，北方少数民族对“纛”的理解，有别于中原，它拥有着“神祀”的地位，承载着民族信仰与政治的双重寓意，并逐步形成了独特的“拜纛”文化传统。

曾在北方草原称雄的突厥族阿史那氏，“建廷都斤山，牙门树金狼头纛，坐常东向”（《新唐书·突厥传上》）。他把“纛”设在自己的牙帐之外，以此来标示可汗的身份。可以说，这成为北族纛崇拜的滥觞。到了后来，爆发历史上著名的“安史之乱”，安禄山和史思明二将逞凶一时，唐卫戍军队不堪一击，溃败千里。肃宗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，不得不“借师助剿”，请回纥兵南下讨逆。唐大将郭子仪与回纥兵会呼延谷时，回纥族的葛勒可汗“恃其强，陈兵引子仪拜狼纛而后见”（《新唐书·回鹘传上》）。这里传递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，即回纥同突厥族一样，也奉行拜纛。“纛”上为什么施之金狼头呢？这恐怕与民族宗教崇拜和其尚武传统不无关系，“侍卫之



苏鲁锭

士,谓之附离,夏言亦狼也。盖本狼生,志不忘旧”。在盛行狼图腾的北族中,“纛”被置于万分神圣的地位,“狼头纛”也成为突厥族、回纥族的族徽。

除此之外,“纛”在“礼仪”与“信仰”的双重作用下,又衍生出了另一功能,即王权的象征。根据《旧唐书》卷五十五《刘武周传》记载:“突厥立武周为定杨可汗,遣以狼头纛。因僭称皇帝,以妻沮氏为皇后,建元为天兴。”该书卷五十六《梁师都传》也记载着类似的故事,其中也讲到:“突厥始毕可汗遗以狼头纛,号为大度毗伽可汗。师都乃引突厥居河南之地,攻破盐川郡。”熟悉唐代历史的人都知道,刘、梁二人为了僭越称帝,不惜以突厥为宗主,从而博得突厥势力的青睐,以获得强大的军事援助。相应地,突厥可汗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考虑,便遣以“狼头纛”诰封此二人为“可汗”。通过此举,刘武周、梁师都二人如愿以偿地获得了突厥人授予他们的权力,这也说明,作为民族象征的“狼头纛”,更寓有深刻的政治内涵,即行使可汗权力。

大抵10世纪的时候,契丹族作为草原上新兴的力量逐步崛起,游牧于“松漠之间”。在所有关于契丹族的史料记载中,我们已经找不到“狼头纛”的痕迹。代之而来的,是美丽的“青牛白马”传说。不过根据史料记载,契丹人依然继承了前族的“拜纛”习俗,植有“纛”。北宋熙宁八年,即辽大康元年(1075年),在中国科技史上取得重要成就的一个宋人——沈括,曾作为使臣向契丹皇帝耶律洪基朝贺。返程



执纛仪式

后,他整理一份旅行日记《熙宁使虏图抄》,是这样讲述在辽国见闻的:“东毡庐一,旁驻毡车六,前植纛,曰太庙,皆草莽之中。”契丹“纛”也是被奉若神明的,称之为“神纛”,采取措施加以安奉,并且制定了相应的法条,凡亵渎者论法诛之。辽保宁五年(973年)二月丁亥日,有个契丹侍人叫实鲁里误触神纛,就险些被处死。通过多种记载,我们得知契丹的“神纛”为数不少,共有十二个。这“十二神纛”被列入“国仗”首位,“凡大祭祀、大朝会,以十二纛列诸御前”(《辽史·国语解》)。可惜的是,《辽史》中仅留下一次契丹人举行“十二神纛礼”的记录,发生在公元1048年,当时在位的皇帝是辽兴宗。

那契丹族“神纛”究竟有无政治寓意呢?想解开这个疑问,得在元人脱脱所修的《辽史》中寻找答案。该书第五十八卷《仪卫志四》记载:“遥辇末主遗制,迎十二神纛、天子旗鼓置太祖帐前。”这里提到的“遥辇末主”当指的是痕德堇可汗,他将“十二神纛”传于耶律阿保机,意味着契丹社会最高权力易手,由“遥辇氏”转入“耶律氏”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,每逢王

朝更替，后继者总要使尽浑身解数，为自己寻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，以此来宣扬政权之正统。耶律阿保机也不例外，他要向契丹人民表明，就像原来遥辇氏承袭大贺氏那样，他不过是遥辇氏事业的继承者。因此，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来粉饰其“得位之正”，而得有契丹“神纛”成为他的首选目标。尔后，他的儿子耶律德光即位时也同样如此，置神纛于大殿之前。这是因为契丹传统世选制的遗存，时为皇太子的耶律倍以及李胡均有继承皇位的资格，这对辽太宗始终是个潜在的威胁。他和乃父一样，刻意强调拥有“神纛”，意在说明自己是契丹政权的合法继承者。这一点表明，契丹“神纛”也成为君王兴替的标志。

蒙古人征战欧亚大陆，有着数不尽赫赫战功。殊不知，这个民族的勃兴史与“纛”也有着深刻的渊源。波斯人拉施特在

《史集》中记载：“成吉思汗击溃乃蛮人并杀死太阳汗之后，虎儿年，他在斡难河流域，竖起了九尾白纛举行大会和大宴；并（在那里）被尊为成吉思汗。”这件事情对蒙古族来说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，成为民族历史的转折点。此事也被载入了《蒙古秘史》，该书卷八曰：“既平毡壁之百姓，寅年聚会于斡难河源。建九游之白纛，奉成吉思合罕以号焉。”而今在鄂尔多斯民间，仍然流传着有关“纛”的传说：有一次成吉思汗出战失利，损失惨重，在万般无奈之下，他将自己的马鞍朝天反置，下跪向长生天祈祷：“我的天父，请您救救我，赐予我力量吧。”于是空中一声霹雳，降下一柄神矛挂在树上。他立刻命木华黎取下，用八十一匹公马的马鬃做成神矛的缨子，命人备一万只羊供奉。从此，蒙古人将神矛作为战纛，打仗时由木华黎高举，所向



神纛祭台

披靡。当成吉思汗去世后，“纛”承继和寓含着蒙古人对成吉思汗本人的信仰，称为“阿拉腾苏鲁锭”(altan süld)。20世纪30年代，俄国学者符拉基米尔指出：“依照蒙古人的迷信，以为成吉思汗的灵魂凭依于这个纛上，因此它就变成了该氏族(黄金家族)和其属下蒙古人民的守护神。”乌云格日勒博士曾对护守成陵的达尔扈特人做过调查，“苏鲁锭”确实被视为该民族的“天降神物”。时至今日，它犹在成吉思汗灵宫外150米处的苏鲁锭祭台上享受着“日祭”、“月祭”、“年祭”以及每逢龙年的“龙年威猛大祭”。

不同的土壤却滋养着相似的文明，这得益于文化的交融性和传承性。生活在东北地区的满洲人定鼎中原后，依然延续着拜纛的传统。据《钦定大清会典图·礼制》，每逢郊劳时，“筑台于郊，设黄幄……建凯旋纛于台上”。纛台居正，属于“天位”，供皇帝褥拜。经略大将军、从征各官于西班，王公大臣于东班，进行礼拜，整个仪式甚为隆重。皇帝检阅八旗军队时，在“帐殿外，左右两翼，各建黄龙大纛一”，“八旗给使官及各侍卫按翼乘骑排列两旁，东西列八旗门纛，台前左右三旗，蒙古角五旗”。武备中，有八旗都统纛、八旗佐领纛、八旗催领纛等，其职能各异。

马背上的民族逐水草而居，游牧于广袤的大漠，皇帝的牙帐不择一地，四季移动。他们所敬奉的“纛”亦如此：突厥“狼头纛”树于汗帐；契丹“神纛”伴随着太庙移动；蒙古人的“苏鲁锭”与安置成吉思汗陵寝的“八白室”一起迁移。在《辽

史》记载中出现了“神纛车”和“总纛车”，他们驾以御驼，载着“神纛”随行皇帝四时捺钵。至于北族“纛”是什么样子，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话题。《辽史·国语解》对“神纛”作出大致描述，其谓：“从者所执。以旄牛尾为之，纓枪属也。”可惜，契丹人早已消逝于历史长河之中，契丹“神纛”的形制也就无从考了。但是那个由达尔扈特人世世代代守护的、被蒙古人奉为“神物”的“黑纛”(即苏鲁锭)仍在陵园。“主纛”位于中央，由四个“臣纛”环绕四周，均呈剑形，马鬃作为垂纓。这与记载中的契丹“神纛”“以旄牛尾为之，纓枪属也”的形制颇为类似。根据对达尔扈特老人的采访，苏鲁锭亦可称为“慧眼黑纛”，如《苏鲁锭桑祭词》所诵，苏鲁锭“用千只智慧眼怒目而视，把遍地的妖孽之敌，踏在脚下连滚带爬”。这里一味强调“黑”，便于与契丹人尚黑风俗联系在一起。契丹人的常服，以紫黑色为贵。国舆中的“木辂”和“芳亭辇”皆为黑质。达尔扈特人的“苏鲁锭”祭拜仪式、契丹人的“十二神纛礼”、“苏鲁锭”随行于“成吉思汗八白室”以及《熙宁使虏图抄》所谓“太庙前植纛”的记载，这种种的相似之处，载写着“纛”在游牧民族之中的传承与延续，诠释着北方游牧文化的深邃。而蒙古族世代相传的“苏鲁锭”及其祭拜仪式，为我们认识契丹族乃至其他北方游牧民族的“纛”提供了蛛丝马迹，成为民族文化的“活化石”。

作者单位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